

從文學革命到政治革命

——《新青年》翻譯的價值趨向

• 林立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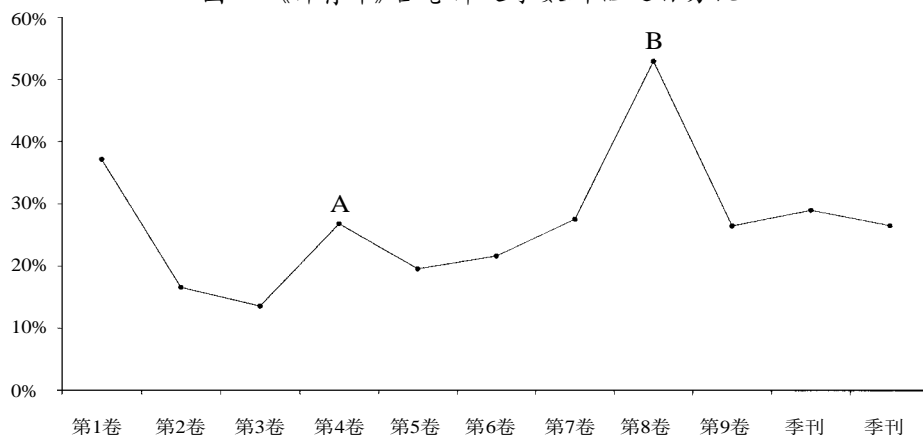
八十年前的新文化運動，具有多面而複雜的形象。有的研究者強調這是一場文學革命，而另一些學者則注意其反傳統和政治思想革命的性質。文學革命和政治思想革命的關係，也受到相當關注。由於陳獨秀說過：「欲革新政治，勢不得不革新我國據於運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學。」^①所以，學術界一般都把文學革命歸為知識份子力圖用文學來改造社會的結果，並認為文學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前導，即先進行文學革命以改造人心，政治改革則水到渠成。事實上，無論是文學革命，還是政治、倫理革命，都離不開翻譯外國的著作，而外國翻譯著作的種類性質和所佔的比例是可以計量的。因此，我們可以通過對新文化運動中翻譯外國著作的計量研究，來把握文學革命和政治革命的關係。

如果我們對《新青年》雜誌中的翻譯作計量研究，首先看到的正是新文化運動文學革命的性質。在《新青年》發表的文章中，翻譯佔總字數的24%；而在翻譯作品中，文學作品的份量又佔了一半以上。進一步統計翻譯作品在各卷中的比例，文學革命和政治革命的關係便一目了然。圖1表明，《新青年》翻譯外國著作有兩個高峰。第一個高峰是第四卷（1918年1月至6月），翻譯作品中文學類達89%左右。這無疑呈現出當時文化運動的文學革命性質。第二個高峰在第八卷（1920年9月至1921年4月），翻譯量超過全部文章字數的一半，其中文學類只有23%，而政治類和社會類則佔了73%左右。顯然這兩個高峰的存在表示文學革命在前，政治思想革命在後。它似乎證實了文學革命是政治革命先導的論點。

但是，深入考察文學革命和政治思想革命的關係，則可以發現情況並不是如人們普遍想像得那麼簡單。中國歷史上雖有文以載道的傳統，但今天我們稱之為文學的小說和戲劇之類，在中國向來地位低微，是「君子弗為」的小道^②。直到晚清，小說的地位才得以提高。知識份子重視小說的原因正是看到文學可以改變人的精神，以推動政治變革。1872年問世的《昕夕閒談》，是晚清最早的翻譯小說之一，譯者在1904年改定版中稱他的目的在灌輸民主思想^③。甲午翌年，英國教士傅蘭雅（John Fryer）在《萬國公報》上宣稱：「竊以感動人心變易風俗，莫如小說。」^④梁啟超更提出「小說界革命」，他說：「日本之變法，賴俚歌與小說之力，蓋以悅童子，以導愚氓，未有善於是者也。」^⑤梁啟超眼中的小說，功能在教愚民、開民智，小說並非只是一種文學體裁，更是政治改革的工具。

由於陳獨秀說過：「欲革新政治，勢不得不革新我國據於運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學。」所以，學術界一般都把文學革命歸為知識份子力圖用文學來改造社會的結果，並認為文學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前導，即先進行文學革命以改造人心，政治改革則水到渠成。

圖1 《新青年》各卷譯文字數所佔之百分比



A：文學革命湧現，文學著作佔譯文總字數的89%；而譯文佔總字數的近30%

B：意識形態更替的顯現，政治社會思想佔譯文總字數的73%；而譯文佔總字數一半以上

1898年，梁啟超撰〈譯印政治小說序〉，曰：「六經不能教，當以小說教之。正史不能入，當小說入之。語錄不能論，當以小說論之。律例不能治，當以小說治之。」^⑥梁啟超把小說譽為「國民之魂」，後來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中更視小說為「文學最上乘」者。小說經梁啟超等人的大力強調頌揚，已不再是以往九流不入的小道，而成為改造民眾心靈的利器，以至於1902-17年間以「小說」為名的雜誌有二十九種之多^⑦。

據阿英的統計，1875-1911年間，翻譯小說多達六百多種，而陳平原根據阿英的資料再作整理統計，發現1906-1908這三年為晚清翻譯小說出版的高峰，分別為110種、126種和97種，大致是創作小說的兩倍。翻譯小說氣勢之盛，甚至有創作冒充譯作出版。

正是在這個過程中，翻譯外國文學也被視為具有政治改革功能。1900年林紓就寫道：「欲開民智，必之學堂，學堂功緩，不如立會演說，演說又不易舉，終之唯有譯書。」^⑧1902年周桂笙在他編訂的《新庵諧譯初編》中，說明翻譯的宗旨在「覺世瞶民」、「開智啟慧」。後來魯迅亦說：「我們在日本留學的時候，有一種茫漠的希望，以為文藝是可以轉移性情，改造社會的。因為這意見，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紹外國新文學這一件事。」^⑨據阿英的統計，1875-1911年間，翻譯小說多達六百多種，而陳平原根據阿英的資料再作整理統計，發現1906-1908這三年為晚清翻譯小說出版的高峰，分別為110種、126種和97種，大致是創作小說的兩倍。翻譯小說氣勢之盛，甚至有創作冒充譯作出版^⑩。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辛亥前對小說在開民智功能的重視並沒有引發文學革命，文學革命也沒有成為政治思想革命的前導。1915年《青年》雜誌創刊被視為新文化運動的開始，當時亦刊登很多文學和翻譯作品，但這並沒有立即引起文學革命。雖然，「文學革命」這個詞最早出現於胡適在1915年的〈送梅觀莊往哈佛大學詩〉中：「新潮之來不可止，文學革命其時矣。」^⑪但眾所周知，要等到1917年，胡適於《新青年》二卷五號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出八不主義，陳獨秀在《新青年》二卷六號進行響應，發表更激烈的〈文學革命論〉，文學革命的烈火才被真正點燃起來。這說明，僅僅重視文學的改造社會功能，並不能造就文學革命。因此，五四時期文學革命和政治思想革命的關係必須進一步從新的層面來探討。

分析圖2可以幫助我們找到五四時期文學革命出現的獨特機制。圖2中有關外國文學類的翻譯明顯存在着兩個低谷。一個是第三卷（1917年3月至8月），文學在翻譯中所佔的比例從1916年的82%下降到約35%。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以前，翻譯作品差不多都是用文言或半文半白的語體寫成；在此以後，從四卷

圖2 不同類型譯文佔各卷譯文總字數之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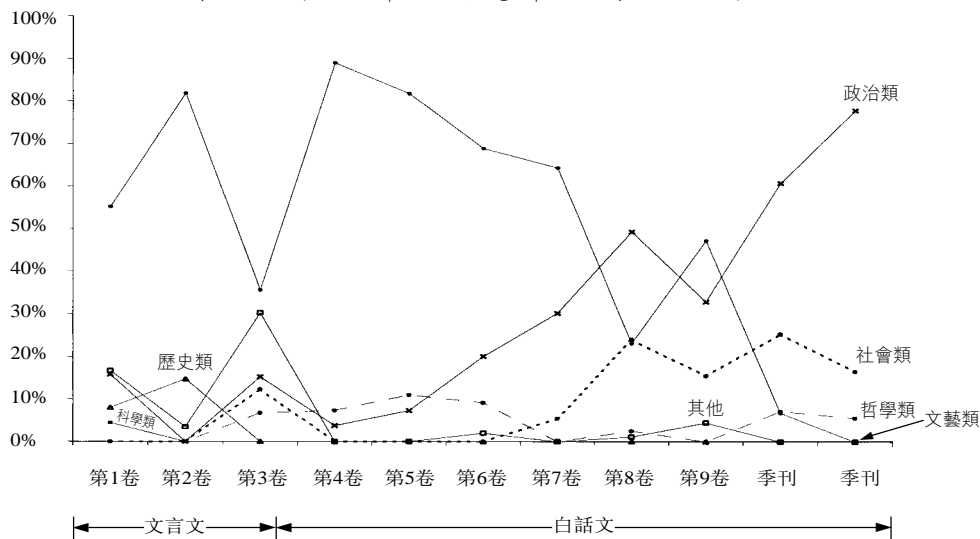


圖1、圖2是根據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進行的「中國現代政治觀念形成的計量研究」對《新青年》的字數統計和內容分析，以及北京大學未名科技文化發展公司出版的《新青年》全文光盤的數據製作的。在內容分類方面，文藝類包括小說、詩歌、戲劇及文藝理論；哲學類包括倫理思想和宗教內容；社會類包括經濟、勞工等問題。另外，杜威(John Dewey)的一系列演講錄，雖不是由《新青年》直接翻譯，但也計算在政治類譯文之內。統計數據和製圖得吳嘉儀小姐、李潔兒小姐協助完成，謹此致謝。

一號開始使用白話文，其後則幾乎全用白話。因此，1917年的這個低谷可以視為文學革命的開始。進一步對比圖1，可以看到第三卷不僅是文學作品的低谷，而且是翻譯的低谷。翻譯低谷表明這一時期知識份子較注重自己寫文章，並不以翻譯來表達自己的思想。那麼第三卷中知識份子表達了甚麼價值取向？考察第三卷所刊載的作品，以反儒反孔的文章佔最多，全卷五十八篇文章中有十五篇是反儒反孔的^②。「隻手打倒孔家店」的吳虞在這一卷一連五期發表批評舊禮教的文章。這說明當時《新青年》的關注點在打倒吃人的禮教，進行倫理革命。倫理革命的性質決定了《新青年》刊登的作品以本國作者批判儒家學說的文章為主，故譯作比重因而大幅下降，小說更是受到忽略。

必須指出的是，作為文學革命的白話文運動正是由倫理革命所引發的，這在統計上可以明顯看出。繼注重倫理革命的第三卷後出版的第四卷，譯文字數比第三卷增加一倍，其中文藝作品接近九成。從此白話文學就席捲全國。分析其內容，更可看到用白話文學湧起的內在動力：知識份子用它來支持倫理革命。例如第四卷六號是「易卜生專號」，該期基本上是由易卜生(Henrik Ibsen)的《娜拉》、《國民之敵》、《小愛友夫》三個劇本組成的。胡適一語道破為何這些劇本在當時這麼重要，他在《易卜生主義》中說：「易卜生把家庭社會的實在情形都寫了出來，叫人看了動心，叫人看了覺得我們的家庭社會原來是如此黑暗腐敗，叫人看了曉得家庭社會真正不得不維新革命：——這就是易卜生主義。」^③另外，袁振英的《易卜生傳》說：「易氏之新思潮，如好花怒放，甘冒天下之大不韙，果敢無倫，前人之不敢言者，彼乃如鯁在喉，以一吐為快；發聾振聵，天下為駭，此氏所以有『惟天下之最強者，乃能特立獨行』之語也。」並謂：「易氏雖為一有名之大劇作家，然亦一大革命家也。」由於文學革命和反傳統的倫理革命

必須指出的是，作為文學革命的白話文運動正是由倫理革命所引發的，這在統計上可以明顯看出。繼注重倫理革命的第三卷後出版的第四卷，譯文字數比第三卷增加一倍，其中文藝作品接近九成。從此白話文學就席捲全國。分析其內容，更可看到用白話文學湧起的內在動力：知識份子用它來支持倫理革命。

從第五卷起，《新青年》中的翻譯數量不斷增加，到第八卷達到高峰。而在翻譯文字中，政治、社會類翻譯的比重一天比一天大。這充分顯示了文學革命中知識份子對外來政治社會理論的渴望，在很多知識份子心目中，外來翻譯文章開始成為新的政治制度合理性根據。

存在着緊密的邏輯聯繫，無怪乎陳獨秀當時將白話文稱為文學的德謨克拉西^⑩，以反對一切不平等的階級特權為目標。

舊的倫理制度作為政治制度合法性根據一旦被摧毀，一個必須引進新的政治理論作為政治制度合法性根據的問題便立即出現。正因為如此，從第五卷起，《新青年》中的翻譯數量不斷增加，到第八卷達到高峰。而在翻譯文字中，政治、社會類翻譯的比重一天比一天大，第八卷文藝類只佔譯文總數的23%，政治和社會類譯作加起來則佔譯文總字數的73%。這充分顯示了文學革命中知識份子對外來政治社會理論的渴望，在很多知識份子心目中，外來翻譯文章開始成為新的政治制度合理性根據。分析第八卷的譯作內容，可以看到，本卷的政治譯作大部分是「俄羅斯研究」系列的作品，以及其他有關社會主義的文章，這不同於《新青年》早期多譯介歐美自由主義的著作，《新青年》最終轉向認同馬列主義。此後不久，《新青年》的政治傾向更為明顯。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則變為共產黨機關刊物。

當然，僅僅根據《新青年》的翻譯分析來揭示五四文學革命和思想革命的關係是遠遠不夠的。但計量研究卻宏觀地顯示了五四文學革命和政治思想革命複雜的互為因果性質；文學革命由政治倫理革命所引發，而又進一步為新的政治思想革命奠定基礎。兩者的互相依存似乎表明了新文化運動深刻的整體一致性：它不僅是政治意識形態的更替，也是書面語由文言到白話文、思想方式由傳統到現代形態的範式轉化。

註釋

- ① 陳獨秀：〈文學革命論〉，《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1918年5月15日）。
- ② 王宏志：〈文言與白話——晚清以來翻譯語言的考察〉，《翻譯學報》，第三期（1999年3月）。
- ③ 趙遐秋、曾慶瑞：《中國現代小說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3），頁124-45。
- ④ 傅蘭雅：〈求著時新小說啟〉，《萬國公報》，第七十七卷（1895年6月）。
- ⑤ 梁啟超：〈蒙學報演義報合敘〉，《飲冰室文集》之二（上海：中華書局，1936），頁56。
- ⑥ 梁啟超：〈譯印政治小說序〉，《飲冰室文集》之三（上海：中華書局，1936），頁34。
- ⑦ 陳平原：《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頁68-69。
- ⑧ 林紓：〈譯林〉敘，引自羅新璋編：《翻譯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頁161。
- ⑨ 魯迅：〈譯文序跋集〉，《魯迅全集》，第十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 ⑩ 阿英編：《晚清戲曲小說目》（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同註⑦陳平原，頁28-29、42。
- ⑪ 胡適：《嘗試集》（台北：遠流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6），頁217。
- ⑫ 郭武平：《新青年雜誌與民初中國意識轉變》（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生論文，1980），頁259。
- ⑬ 胡適：〈易卜生主義〉，《新青年》，第四卷第六號（1918年6月15日）。
- ⑭ 陳獨秀：〈我們為甚麼要做白話文？——在武昌華文大學講演底大綱〉，《晨報》，1920年2月20日。